



中国经济： 转型与增长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美] 巴里·诺顿 著

安佳 译

F124

112

F124

112

中国经济： 转型与增长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美] 巴里·诺顿 著

安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 转型与增长/(美)诺顿
(Naughton, B.)著;安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书名原文: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ISBN 978 - 7 - 208 - 09328 - 7

I. ①中… II. ①诺… ②安… III. ①经济发展—研
究—中国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143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摄影 陈志民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中国经济: 转型与增长

[美]巴里·诺顿 著

安佳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2.25 插页 4 字数 514,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328 - 7/F · 1958

定价 58.00 元

中文版序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三十年的持续增长,使沉睡多年的中国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于是,这一宏伟业绩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就成为世人关心的热点。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两大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二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产业经济。前者被称为转型,后者则被称为增长。什么样的“转型”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完成“转型”与“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一幅怎样的图画?中国的转型与增长和世界上其他转型经济体的异同与优劣表现在什么地方?为学者甚至一般公众留下了诸多疑问,需要给予回答。古老国家发生巨变的主要力量即经济“转型”,引起了世界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思考和探究。

2007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它集中了诺顿教授和西方学者以及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作了全面的介绍和系统的分析,受到了海内外关心中国的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从国外各大图书网站上的读者评论也可见一斑。现在,这本书的中文版也与中国与读者见面了。中文版的出版,为中国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文本。

在我看来,诺顿教授这部著作有三个主要的优点:

第一,它对中国经济的分析,首先是实证性的,回答的问题首先是事物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例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即使出现了某些规范性的分析,

也是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的。而在中国传统的经济学著作中，往往不问事实实际如何，先作出事物应当如何的规范性规定，然后推论出它必将如何发展，结果，就使我们的许多经济学著作变成了孙冶方所说的“道德训条大全”，完全脱离了实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有时还摆脱不了传统方法的影响。

第二，与上一条紧密相关的是，本书的分析都建立在经过检验的翔实数据的基础之上，使这些结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例如，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本书首先介绍了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历史遗产，叙述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了从传统经济中挣脱出来所做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努力，包括建立计划经济的努力，从而为读者理解当前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增长建立了基础。然后，他用了15章的篇幅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而在每一章里，他都是从状况和过程出发，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诺顿教授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与他经过严格的经济学科班训练有关外，还得益于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就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处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这一经历为诺顿教授提供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和资料积累。

诺顿教授把他数十年的理论和经验数据积累汇集在这本书里，对中国复杂的经济局面作了清晰的解读，使包括中国读者在内的所有读者能够分享，值得感佩。还要说明的是，在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诺顿教授对英文版的经济数据重新进行了校阅和更新，使本书提供的资料更为全面和准确。诺顿教授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本书的研究视角广阔，不仅有宽广的历史视角和全局视角，还有比较的视角。诺顿教授从教育背景来说，学的是比较制度分析。在这本书中，他很好地运用了自己的专长，把中国经济发展置于多国比较的背景中，联系其他转型经济体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以及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德国等进行比较研究，更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运作以及复杂而又充满活力的发展。正是缘于诺顿教授扎实的功底，这本书被一些外国学者评价为“是理解和讲授下一个经济强国的标准参考书”。

总之，诺顿教授这本专著的中文版的出版，对于正在总结30年市场化改革经

验和规划下一步改革进程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当然,写书和建筑一样,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当书籍写成出版以后,回头一看,往往会感到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诺顿教授这本杰出的著作来说,在我看来,在它对中国转型的两个基本分析框架,一个是“计划外成长”(growing out of the plan),与另一个,也是更主要的分析框架——“渐进主义”(gradualism)之间,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和不够清晰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厘清。好在诺顿教授在书中提供了丰富的实际材料,可供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吴敬琏

2010年7月12日于北京

中文版前言

自《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的英文版面世以来，中国经济表现之优异甚至超过了多数乐观学者的预期。2003—2007年，中国还是全球经济繁荣的组成部分，不过，中国竟然避开了2008—2009年最为糟糕的全球金融危机。截至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恢复到可媲美于危机前的水平。因为这种经济表现，中国在2010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大出乎之前的预期。

过去五年来横扫世界和中国经济的诸般大事任何人都没能预见得到，本书初版时也没有试图进行具体预测，但平心而论，过去几年发生的经济事件已经证明了本书所采用的解释架构的有效性。本书基于中国正在经历的结构变化过程和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基本事实，从根本上对中国经济持乐观看法。一直以来，中国的结构变化过程与其他东亚“奇迹”经济体经历的过程极为相似，但是，中国的结构变化首先得益于成功的经济改革规划，其次得益于一系列保增长政策。此外，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其他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中国结构变化的步伐较快，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时间都快于和长于世界历史上的所有经济体。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情况一如本书初版所展示的：转型和增长仍然是核心驱动力。

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中非同寻常的快速转型引出了我们在英文版中很少关注的一些新问题。首先，如此快速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正在接近于发展的末期，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开始目睹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次，出乎我们的预期，中国已经采用并强化了某些政府控制经济的制度，因

此在英文版中对中国向“更加正常”的经济体迈进的长期趋同过程的描述，较为合理。这一过程目前仍在继续，中国正在沿着一条宽广的转型道路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趋进。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趋同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放缓，同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揭示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普遍性问题，这一制度趋同的过程将会更为缓慢。这些变化都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1. 中国与世界：增长和危机

中国是2004—2007年世界经济繁荣的主要参与者。这次全球性经济繁荣踩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脚步迅即出现，并非偶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拆掉了其商品生产部门的贸易壁垒。私营部门不仅成了重要的出口商，而且享有更顺畅地获取进口投入品的通道。这些政策导致出口部门生产力增长加速，中国开始以实实在在的低价向世界经济提供日渐增多的出口商品。与此同时，美国也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允许美国居民增加负债的金融创新，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需求迅速增长时期。生气勃勃的美国需求和丰裕充沛的中国供给相互影响，创造出世界范围的繁荣。中国在保持对美国持续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从世界其他地方迅速增加了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对繁荣世界贸易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从日渐增长的经济一体化和红红火火的国际贸易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持续加速，2007年达到了让人惊叹的13%。但在这些好消息后面，问题也在不断滋生。中国和美国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尽管角度不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拥有大量的外部顺差(即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包括服务贸易)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表现出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并引发了贸易之争。然而，结束这次繁荣的并不是中国的外部贸易失衡，而是美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不可持续性。2007年中，美国住宅市场的繁荣已经明显露出颓势，由于房屋价格的下跌，金融体制其他方面的脆弱性马上显现。2008年，美国全面陷入了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繁荣戛然而止。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状况也在2008年急剧恶化，2008年10月之后，美国金融危机发展成全面危机。

但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竟能避开2008年10月始自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多

方面不良效应。通过及时部署的大量有效的刺激计划,中国得以在2008年底止住了威胁世界经济增长下滑趋势。中国是第一个走出危机的经济体,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的复苏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的衰退,也为全球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对中国来说,21世纪非同寻常的经济增长业绩是21世纪头10年中期的增长趋势加上2009年较早摆脱衰退而发展的总和。

2. 增长的失衡

迅速摆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持续结构变化有关。正如本书第6章所说,中国经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特点。中国对总产出的投入比例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总产出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也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意味着,这些独特的结构性特点并未发生变化,因此中国其实更大地偏离了全球规范。比如说,中国固定投资对总产出贡献在2009年超过了46%这一改革时期的纪录。政府将资源大量注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动机是一种短期动机: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刺激国内需求,因此可以防止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然而,这种短期政策导向也标志着中国经济长期趋势的持续性。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看成优先于需求的任务(见第14章)。政策的驱动力是期望新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可以改善生产力,提高经济活动水平,甚至想创造出新的基础设施供给品的服务需求。从中国2008—2010年的刺激政策看,由于短期政策与现有长期政策配合紧密,所以短期政策的实施非常迅捷,而且惊人平稳。这一结果显然迅速改善了我国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系统,成为全部基础设施都更为发达的国家。

然而,这些成就也付出了代价。自200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呼吁要有一个更为“均衡”的增长模式以及要转变增长模式。这些目标现在已经包括在2005年通过并于2006年到2010年实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之中。这一指导思想是期望采用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即更少使用重工业投入(和投资),更多使用中国人一直以来累积的技术和教育的增长模式。这些复杂的变化我们将在稍后作深入的讨论。虽然这一政策也在最低限度上要求拉升中国经济的国内消费比重,减少用于投资和净出口的最终产品比重,但到目前为止,这些目标并未实现。由于21

世纪头 10 年的投资都在持续增长，所以居民消费比重实质上也在下降。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虽然绝对意义上的居民消费增长迅速——大大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比重——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快，经常超过居民消费增长 2 到 3 个百分点。因此，居民消费占总产出中的比重也在稳步下降。2009 年，居民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6%。这一数字大大低于诸如美国这类由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国家的数字，21 世纪头 10 年初期，在这类经济体中，消费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 70% 的极端水平，而在 1945 年之后的多数时间里，消费在这类国家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以上。虽然我们没有理由让消费达到类似于美国那样的高水平，但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实质性增长可以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更加多样化，也更有意义。此外，消费也是最终需求的最稳定来源，因为消费受到人的需求和习惯的驱动，无论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收入如何波动，居民也会本能地平滑自己的消费。与此相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如果未来预期让人失望，私人投资就可能（理论上）下降至零。虽然中国政府在 2009 年能够很快提升投资水平，但展望未来，对投资的绝对依赖肯定会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

中国经济另一失衡指标就是 21 世纪头 10 年一直在发展的大额外部顺差。如上文所说，中国的外部顺差在 2007 年之前一直在增加，2007 年之后稳定了下来。然而，从 2009 年年中开始，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原因很明显：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之故，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正在下降。2009 年，在世界贸易大幅下滑的同时，中国积极的经济刺激计划和经济的快速复苏使中国在 2009 年下半年出现了进口需求普遍上升的局面。2009 年年中之后，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事实上已经减少。因此在 2009 年，净出口已经达到较为合意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5%，2010 年初，顺差还在继续减少。但是，这种减少多半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增长模式的全面重新调整。国外需求的强劲复苏或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紧缩，都会很快引发顺差再次膨胀。很显然，中国的增长模式依然很“不平衡”，未来的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由投资和出口增长决定。

3. 增长的阶段

中国在过去几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中国面临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的急迫任

务。中国一直快速地积累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除了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基础设施发展以外,由于新工厂和新住宅的快速开工,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也很快。但一直以来,人力资本的增长也不慢。一直到2000年,大专和大学毕业生也还只有100万之众,但截至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0万。小学入学情况的改善意味着,教育金字塔的底部正在强化。这个数字的变化表明,中国的要素禀赋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不再只是劳动丰裕和土地及资本稀缺的经济体,中国现在正在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比较优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由于采用了与其要素禀赋相一致的向劳动密集型部门倾斜的增长策略而衍生出巨大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过分偏向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战略。)现在,依赖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期也已经走到了终点。变化的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正在使中国离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把中国推向新的生产部门。

大体上,这种转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渐进而平稳地发生。但这里有两个原因使我们怀疑,这个过程在中国将会更加混乱。首先,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多年来,中国一直依赖于表面看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村劳动储备。随着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差不多无限量供给的农民工愿意进入城市从事这类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与此同时,因为相对而言劳动在农村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在外出打工人员离开以后,农业生产还能维持。但现在这一阶段已经走到了尽头。日渐增多的农村调查表明,所有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已经外出,至少在中国中东部交通条件较好的那些村庄里,年轻人都已经外出。如我们在第5章所说,这些年轻人外出打工时,几乎都处于15—30岁这个年龄段。现在,整整一代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人完全没有直接的农作经验,他们的成长岁月都在求学和寻找城市工作中消耗掉了。为了从更为遥远的乡村吸引农民外出打工,为了吸引那些可能已经在农村接受过其他良好的职业教育的人外出打工,城里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比如在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工资已经开始大幅上涨。有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始于2006—2007年。然而,这一过程却因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下滑而中断,当时,许多城市工人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工人都失去了工作。但由于中国在2009年下半年

的快速复苏,对劳动力的需求又重新振奋起来。因此,珠江三角洲出口加工区的工资上涨压力较之以前更为明显。在其他发达地区,尤其是浙江和苏南地区,也明显具有相同的压力。

对很多观察者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或是取之不尽的劳动力供应时期已经走到尽头。1954年,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力过剩”经济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Fei Jinghan)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 Ranis)对这一思想作了详尽阐述。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强调,成功的发展可以通过“转折点”来推动经济。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认为,过了这一转折点,工资将会大幅上涨,收入不平等现象会减少,他们经常引用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来支持自己的理论。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现在正在经历转折点,接下来将会出现社会和经济的急速变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确信他们所谓的“转折点”真的能带来这种激烈而突兀的变化。或许,类似于中国台湾这种小型经济体能够出现这种独特的转折点,而中国这种大型经济体是否也会因一个突然的转折点而成为某种经济体,眼下还不甚清楚。或许中国将发生的这些变化会成为更为渐进和长期的转型过程的组成部分。

无论如何,由于人口变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在第7章已经描述过在过去20年使中国获益的人口“良机窗”。从现在开始——2010年之后——这个良机窗将逐渐关闭。因为中国人口出生最多的年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以新生劳动力的最大群体已经在过去5到10年中进入了市场,大批新工人的出现也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总体保持了较高水平(也会对那些寻找工作的工人形成挑战)。从现在开始,进入市场寻找工作的新人将逐渐减少,预期这种情况也会使中国的总体增长率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也会使寻找工作的年轻工人感觉轻松)。这些变化也会促成类似刘易斯和费景汉及古斯塔夫·拉尼斯所描述的由于“转折点”而发生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理论上,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转变可以以一种平稳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然而,其他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要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超快增长阶段转型,常常会引起动荡。1950年到1972年,日本经济每年增长10.4%,但1973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超过6%。韩国的增长模式也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过严重的

困难。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中国向前发展的增长潜力似乎更大。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而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这些先行经济体在到达劳动密集型增长阶段末期时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基于国内市场继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中国没有理由重蹈日本和其他先行经济体经历过的增长率暴跌的覆辙。但是,这种经历也可以成为一种警示,即从一种增长模式向另一种增长模式的转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此外,理论上较为平稳的经济变化也常常会受到现实中不可预期事件的扰乱。中国现在正在进入通常已经预见到的转型时期,但人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一转型会在2015年之前开始。驾驭好这一转型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绝不亚于1978年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4. 驾驭向新增长模式的转型

中国政府已经设计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增长模式转变的规划。我们在上文讨论了政府的希望,中国政府不仅希望增长模式更为“平衡”,而且希望降低过高的投资率和外部顺差。现在我们明白,这一规划不仅仅是(就算最初是)出于对静态的“平衡”问题的考虑,更是希望借助于中国已经累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促成劳动密集型模式向技术密集型模式的转变。

这是一个艰难的政策挑战。长期内,市场力量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中国经济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更加昂贵的劳动力与更为丰裕因此更为便宜的技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已经驱使中国进入了新的比较优势领域。这种自然演化会因为中国的巨大规模而更加容易。从国内来看,中国的国内市场如此巨大,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和工商企业有大把的机会适应新的市场并扩大经济规模。从国际来看,中国已经参与了差不多每种商品的制造,所以与那些规模较小但更专业化的经济体比较,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及进入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相对而言更加简单和直接(见第16章)。因此,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的挑战是,他们想作出多少努力来推动并加速这些变化。

与此同时,现有市场力量已经把中国推入了资本密集行业领域,比如钢铁行业,这种行业都是极端能源密集和污染行业,而且需要密集使用中国短缺而且必须进口的资源(高质量的铁矿石)。因此,就算中国生产出比世界上所有经济体都要多的钢铁,中国好像也不大可能在这一部门拥有可持续的长期比较优势。这些

部门表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挑战。支持这一部门发展的市场力量因监管和价格失灵而扭曲。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改革不完善的领域。在市场不能为外部性比如污染的外部性定价的时候,就出现了市场失灵,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监管取得成功,但要取得成绩却非常困难。在当今中国,政府政策效应和监管效应一直共同发挥作用来降低资本成本和能源价格。因此在未来的进一步改革中,市场会把支持无效益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信号送给民营企业。这些领域中的挑战是改善市场信号的质量,以改变挥霍性地将资本过多地配置在这些相对无效而且污染严重的部门的情况。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自 21 世纪头 10 年中期以来,政府已经提出了“转变增长模式”的目标。这一目标是想通过增加知识投入以及获取更大的生产力收益而提高增长的质量,这就有可能减缓资本和物质投入的增长,并相应减少污染排放。这样做的净收益将是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政策重心从长期增长模式转向了危机管理模式,但随着经济的复苏,政府再次将重心转向了长期增长模式。这种方法的实质可以通过两大主要政策概括:一是鼓励“自主创新”,一是降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

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是中国长期以来志在进口技术以及升级技术能力政策的延续和强化(见第 15 章)。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政策,因为随着中国脱离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中国显然要从事更高技术的活动并实质上要有持续的生产率增长。中国的政策就是通过鼓励和补贴研发、支持采用中国制定的技术标准以及加速新技术的推广而推进这种转变。2009 年和 2010 年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都表明,政府明显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

一段时期以来,降低中国能源消耗的紧迫感一直在不断加强,节能目标也写入了中国的十一五规划(2005—2010 年)。近年来,这方面的努力还在加强。正如本文第二节所述,由于较高水平的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类似钢材和水泥这类能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所以投资率的上升也一直在拖这种努力的后腿。因此,经济的“重新平衡”不仅成了降低中国经济带来的能源消耗和污染之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且有助于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助于全球气候稳定。

这些寻求促进而且加速经济增长模式变化的新方案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

况较为相称。这些目标的紧迫性和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反应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政府会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这种干预措施与另一种更“顺其自然”的方法截然不同。如果采用更“顺其自然”的方法,政府政策将重点改善监管程序和定价程序(包括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虽然这种方法实施起来比较缓慢,但也会发生相同的总体变化,中国仍然会向有较高技术并更有益于消费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道路前进。较强的干预主义措施和中国政府偏好的“积极插手”方法既有潜在的收益,也存在相应的隐患。当然,如果这种政策能够加速增长模式的转变,使中国能够更快地走向更为可取的增长模式,利益才能到手。隐患则来自政府对市场进行多种干预所造成的无法预期的后果。中国政府正在通过行政裁定、强化监管和强制性产业政策,加强在很多具体经济领域的干预措施,不过,这种干预也可能会无意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市场扭曲信号。比如说,为鼓励创新而采用的补贴研发的政策,可以减轻生产者的税收负担,但也会在无意中加重消费者的税收负担。即使在政府的另一个明确目标是刺激消费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此外,政府的这种政策常常会引起针对政府政策的策略反应,比如说,生产商可能针对研究补贴搞些并非真正创新的半吊子研究规划。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有效达成政策的预期效果。

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这些政策将不可避免地经历评价、再形成和调整几个阶段。就像技术促进政策一直碰到的不断学习和不断调整那样(第15章),现有的“转变增长模式”的政策也会碰到不断评价和重新评估的问题。这些政策有的会因为成功而赢得称赞,有的则很快会被确认为无效或具有反作用。无效的政策应该马上废除,以便于实际有效的政策有实施的空间。由于中国政府大力实施“积极插手”的政策决策,所以一个必须回答的老生常谈是,另一种“顺其自然”的政策是否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或者更好的结果。比如说,在技术政策方面,“顺其自然”的政策不仅可以为民营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也可以为它们创造的知识产权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样可能会比向国有企业注入公共资金补贴更能刺激出民营企业的革命性创新。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显然也有助于增长模式的转变,但也存在一种危险,即政府政策也会成为持续经济变化的绊脚石。

5. 体制趋同还是中国模式?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朝“更为正常”的经济形式迈进。改革开放的30年已经

逐渐改革了大多数毛泽东时代的独特制度，使中国成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国际化开放经济体。由于民营企业的兴起，中国变得更为多样化，更具市场导向且生活更加富裕。但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如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方面仍然具有独特性，中国正朝着一个具有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制度基本相似的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的方向迈进。中国漫长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一条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

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体制改革的步伐已经放缓。政府决策者的重心已经转为纠正改革初期阶段出现的某些问题。比如说，政府不是继续推进私有化或鼓励外国投资者，而是重在为农民尤其是西部偏远地区的农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福利。现在，政府也为个人提供（早该提供）在改革初期忽视了的经济和社会机会。由于政府的注意力已从早先过分关注经济改革转移开来，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许多制度得以稳固并强化。比如说，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经济活动中既稳定又重要且相对而言性质明确的角色。肯定地说，到 21 世纪头 10 年末，绝大多数中国产业都是民营企业。然而，政府企业也加强了在战略性部门中的主导作用。石油、电力和通信行业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民营企业要进入这类行业明里暗里都有诸多限制。其他行业，比如钢铁业，则是国有和民营共存，但这种行业也限制竞争，也有民营企业无法逾越的“隐性障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建立，稳固了央企的发展，根除了大型企业的管理层收购。因此，我们渐渐形成了一个预期，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存的独特模式。一个强大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群体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体制的长期特征。此外，从 2009 年开始，中国某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已经开始担忧，具有强大融资能力的国有大企业，正开始遏制中国民营部门此前的蓬勃扩张局面。

国有企业的稳定性和日渐增长的盈利能力鼓舞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来达成自己的政策目标。一流的国有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铝集团都被用来获取海外自然资源。中央政府也要求最具盈利能力的电信企业如中国移动，通过实施 3G 电信标准 TD-SCDMA（政府在国内最优先发展的技术标准），来支持“自主创新技术”计划。这些行动都获得了国有银行的慷慨信贷资助。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银行一直受到坏债的影响，但到了 21 世纪头 10 年末，多数大型国有银行已经卸掉了包袱，重新成为具有偿债能力且资本金雄厚的金融机构（见第 19 章）。与此同

时,2004年之后稳步增加的外汇储备也为政府的这类行动创造了另一个融资来源。虽然大部分外汇储备都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慎管理,但部分外汇却被投资于银行,并出资用于名为中国投资公司(CIC)的新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虽然是长期投资者,但在自己的投资决策中却要时时考虑政府的意愿。由于中国企业既能从政府支持中获益,又能从政府银行获取丰厚的信贷,所以中国企业日渐成长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行为人。

这些变化在某些方面也有助于新型中国模式的形成。基本上,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紧密合作,以及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无所不在的干预。这与美国的经济体制形成鲜明对照。政府、企业与金融组织的合作创造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的集中力。对中国来说,为了尽快成长为一种更多样化、更为分权且更加灵活的创业型经济,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一个最为紧迫的挑战就是控制和削弱这种力量。说到底,这是真正实现向高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阶段转变的唯一途径。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不会向美国或者西欧的资本主义模式趋同。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暴露出来的缺陷。因此我们不奇怪中国领导人的结论,即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市场经济与政府导向相结合的特点。只要中国领导人继续经营这种独特的中国模式,趋同就不太可能出现。

6. 结论

尽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今天面临的是很早就预料到的经济变化,但这个变化来得早了一点,速度也快于外部观察者的预期。因此,虽然中国克服了一些局限性,却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今天,中国站到了大国的门口,即将跨入中等收入生活水平国家的行列。为迎接这一挑战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继续适应各种制度,构建自己的能力,并对急剧变化的环境灵活作出反应。为了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对过去的经验进行评估和评价,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本书希望能有助于这种持续进行的努力。

巴里·诺顿

2010年7月5日